

《韵学源流》作者考实*

白雪华 湛 庐

《韵学源流》是晚清一部著名的音韵学著作，它既可说是我过第一部简明扼要的音韵学史，又是最先在结构上区分古韵研究、今韵研究、反切研究的韵学史，正式刊行后，对音韵学的普及、研究和编撰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罗常培先生所说：“韵学之兴，垂一千六百馀年，流别所衍，支叶繁衍，源委不明，何以深察条贯、辨章然否？清人推迹韵学沿革之作，前乎莫氏者，有万斯同《声韵源流考》及潘咸《音韵源流》二书。万书匡廓粗具，墨漏弘多；潘书凭臆杜撰，难资典要。莫氏此书，理明事简，弗尚烦纤，博赡或弗逮万，而纠缠瞀乱之讥，庶几可免。”^①罗常培校点本问世后，王力先生、张世禄先生均加以引用，许多高校还将《韵学源流》选为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的阅读参考书，进一步扩大了该书的影响。

关于《韵学源流》的作者，本来无甚疑义，民国初年刘师培入蜀，得到遵义赵幼愚的校钞本《韵学源流》，作者即题为莫友芝，之后多种印本均署名为莫友芝撰^②。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邵亭，又号睱叟，贵州独山人，晚清著名学者，有多种著作传世，通音韵训诂之学，符合作《韵学源流》的条件。但是，1963年，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发表《莫友芝与〈韵学源流〉的关系质疑》（见《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后收入其《子云乡人类稿》，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一文，他细核《韵学源流》所据材料的来源，指出全书近两万字，十分之九为引用他人文字，其中主要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次引自戴震《声韵考》等，认为作者的音韵学知识还停留在乾嘉以前阶段，“以莫氏在当时的声望，绝不至于点窜他人的著述作为己作以自污”，因而很怀疑本书作者只是清末一位粗通音韵之学的老先生的课堂讲义。殷氏之论甚为雄辩，发表后

* 本文为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项目成果。

①罗常培校点《韵学源流·后序》，广州天成印务局1929年出版。

②如康宝忠印行、刘师培校《韵学源流》，北京中华新报1918年出版；杨恩元跋本《韵学源流》，贵阳文通书局1923年出版；学林丛刊本《韵学源流》，北平震亚书局1933年出版；章锡琛据罗常培本复校《韵学源流》，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二十多年未遭到有力驳难，遂使《韵学源流》的作者这一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

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在“贵州古籍集粹”丛书中出版了陈振寰先生的《韵学源流评注》，其《前言》中认为“殷氏之论其言甚辩”，但“缺乏实质性的证据，很难据以定案”；陈先生推测该书是莫友芝父亲莫与俦在遵义府学“日以朴学倡其徒，教其子弟”时的讲义而为友芝记录整理成篇者。他又从国家图书馆找到了《韵学源流》原钞本，“从钞本的款式、讳字（帝讳止于顺琰）足证《源流》为道光以前作品，殷先生推测作者为清末塾师自难成立，而我们推测作者为莫与俦，或非无稽”。陈先生虽然否认了《韵学源流》作于清末的可能性，但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作者是莫与俦而非莫友芝，至此，《韵学源流》的作者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90年，梁光华先生撰写《试论莫友芝的〈韵学源流〉》（载《黔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提出两条证据：一是《韵学源流》的最早传钞者赵幼愚系郑珍的外孙，又与莫友芝侄儿莫棠交好，不会误将他人之作当作莫氏作品；二是《续遵义府志·莫友芝传》在介绍莫友芝著作时曾云其著有《韵学源流》一卷。因此认为此书作者仍是莫友芝。但是，严格来讲，第一条证据是就情理而言，尚乏实证；而《续遵义府志》修成于1937年，以后证先，第二条证据恐亦非有力。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陈振寰先生提出的避讳字问题，我们就只好否认《韵学源流》的作者是莫友芝，因为直至道光元年，莫友芝年方十一岁，《韵学源流》若成于道光之前，自然不会是莫友芝的撰著。

根据陈振寰先生的提示，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他提到的“原钞本”。该钞本竖行兰线，工楷抄写，共26页，每半页11行，行32字，双行夹注，亦行32字。首行题写“韵流源流”、“独山莫友芝子偲”。由于没有其他关于钞写者的信息，我们似乎不宜判断它就是“原钞本”。再看该本中的避讳字，“琰”字出现了三处，其中第一处“琰”字未避讳，另两处缺写末笔；“寧”字出现五处，两处作“甯”，三处仍写本字；倒是文中所有的“淳”均写作“淳”，避同治帝讳较为严格。总的说来，其避讳字并未如陈振寰先生所说止于道光，而是显得较为混乱，无法用来鉴定钞本内容的时代，也无法推断它即是“原钞本”。

钞本避讳字的问题虽然可以告一段落，但《韵学源流》的作者仍需要更加有力的证据才能定谳。幸运的是，在台湾元智大学罗凤珠教授的帮助下，笔者得到了一份《韵学源流》稿本的复印件。该稿本原件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室，朱丝栏，三十八页，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四、五字不同；注文小字双行，双鱼尾相向，不记页次，文中有句读，字里行间多涂抹增删，天头地脚时见小字增补。其首页（见图）首行低二格题写“韵学源流”，其下未署作者，但钤有“莫氏子偲”朱文方印，末页钤有“莫印友芝”白文方印。根据稿本字迹和莫友芝的钤印习惯，此稿本作者为莫友芝无疑。我们细核其中的避帝讳字，不仅避清道光前诸帝讳，如“弘”避作“宏”，“曆”避作“歷”，“順”避作“禹”，而

且也避道光帝“旻寧”讳，《韵学源流》稿本中无“旻”字，但出现了五次“寧”字，均避作“甯”或“寧”字。据《大清会典事例》（商务印书馆宣统己酉版）卷三百四十四，清道光初有谕曰：“今朕钦遵（乾隆）成命，将御名上一字敬改。至臣工循例敬避，上一字缺一点，下一字将心字改写一画一撇。”咸丰四年，则有谕“宣宗成皇帝庙讳”，“寧”字“悉改作甯”。按“寧”作“寧”，为本字俗写，作“甯”，则为本字之通假字，两种写法皆由来已久。《韵学源流》稿本中没有出现“諱”字，只出现了一次“奕”字，然而咸丰帝（奕詝）讳不避作为行辈的“奕”，无法据此判断稿本不避咸丰之讳。但稿本中出现了八次“淳”字，均不避同治帝讳（载淳）。则稿本的撰著时间，当在同治之前的道、咸时期，而不是道光以前。作者为莫友芝也可确认。

不过，正如郑珍《郎亭诗钞·序》所云：“其读书，谨守大师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举形声、训诂，或一二说异许、郑处似之，遽虽无以陪诘，意顾不善也。”陈振寰先生也说：“莫友芝在学术观点上，并不是一个尚新求奇的人。”^①通观莫友芝存世的诸种刻本、钞本和稿本，其转述概括他人著述的特点比较明显，如《记周景王大泉》、《记王少伯龙标诗》、《河图洛书俱不可考说》等，大半文字均引自他人著述，《韵学源流》不过是其中之尤者，它可能只是莫友芝在阅读音韵学著作时，为了学习的便利所做的材料概括或读书笔记。根据现在的署名习惯，称莫友芝是《韵学源流》的编著者也许更为妥帖。

另外，莫友芝自己似乎也并不重视这篇早期草稿，这从他并未在稿本上署上自己名字即可看出。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黎庶昌《莫征君别传》、莫祥芝《清授文林郎先兄郎亭先生行述》提到莫友芝完成的著述中有“《声韵考略》四卷”，而并未提及《韵学源流》，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定稿的《声韵考略》自然在质量上会优于草草编成的《韵学源流》。不过阴差阳错，《声韵考略》反而未曾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韵学源流评注·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